

• 民族传统体育 •

## 论中国武术的现代转型与竞技武术的得失

马廉贞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 在总结早期武术现代转型的基础上, 得出国术体系的形成是近代武术现代转型承前启后、不断积累的结果, 是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合理路径, 并由此引出竞技武术在发展中旧时代文化积淀与实验结果的无差别抛弃与排斥, 不但直接导致传统武术文化的断裂, 还造成传统武术价值体系的丢失, 及武术现代价值观的下移, 最终使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在发展中遭遇瓶颈, 面临专业人才匮乏, 学科水平下滑等诸多问题, 使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身体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付出高昂代价。

**关 键 词:** 民族传统体育; 竞技武术; 中华新武术; 精武会; 国术; 文化成本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2)03-0114-07

### On the pros and cons of modern Chinese Wushu transformation and competitive Wushu

MA Lian-zhe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summarizing modern Wushu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rly days, the author concluded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martial art system was the result of constant development and accumulation of modern Wushu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times, a rational way of the modernize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s, and hence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the indiscriminate abandon and rej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in the old days by competitive Wushu during its development has not only directly caused the rupture of traditional Wushu culture, but also caused the loss of the traditional Wushu value system, as well as the degradation of modern Wushu value view, will ultimately result in that during its development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 major will go into a bottleneck situation and face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s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body culture represented by Wushu will pay a high pric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 competitive Wushu; new Chinese Wushu; martial art association; national martial arts; cultural cost

自 19 世纪中期起, 中国发生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内外交困, 国家根基被严重动摇。引发的剧痛促使国人逐步意识到, 惟引进西方文明, 方可“自强图存”, 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序幕。然而, “现代”的获取并不是无偿的。时空交错中, 现代化总是以单向线性的态势出现, “现代”的确立往往建立在颠覆旧的思维模式、价值系统, 乃至整个知识体系的基础之上。正如吉登斯<sup>[1]</sup>所言, 现代性在其发展历史的大

部分时期里, 一方面在消解传统, 另一方面又在不断重建传统。长久以来, 学界对于中国人现代身体意识形成的关注远远不够, 对传统身体文化的现代转型的研究更是鲜见。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 一方面, 这与中国人“重文轻武”的传统有关系; 另一方面, 中国人传统身体意识忽视了“以感性认知为主要体验的身体, 往往先于以理性思考为主导的思维感知到时代的变革”这一事实。

收稿日期: 2011-11-02

作者简介: 马廉贞 (1978-), 男,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民族传统体育学、体育人文社会学。

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史上,民族文化的兴衰起落,往往可以从其身体文化的发展上看出端倪,理出脉络。但凡强势文明的崛起,总是表现出强势的生命力特征与身体价值追求,如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对健美体魄和竞技运动的崇尚,中国战国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汉代对剑技和人兽相搏的崇尚,盛唐时代以健硕、肥壮为时尚的审美取向等。由此看出,探究中国现代化转型中传统身体意识和身体文化形式的变化,实质上就是从身体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化路径进行审视。这当然是相当庞大的课题,不是一篇论文所能承载的。因此,本文仅以中国传统身体练习中最具代表性的武术为切入点,就近百年中国武术现代转型中的3次重要试验为例,进行剖析与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对以竞技武术为代表的新中国武术发展模式、特征,以及它的得失利弊,做一些探究与反思。

## 1 民国武术现代化转型的几次尝试

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文明的强势传入,中国陷入全方位的危机而被迫走上转型之路。“亡国”、“危天下”所引发的存亡危机,使中国人开始对国家的命运进行思考,认识到“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sup>[1]</sup>。然而,短暂的自强中兴之梦,却在屡战屡败的挣扎中迅速破灭。最不能令国人所接受的,是中国自强梦并非被西洋的坚船利炮所击碎,而是被“同文同种”的日本人所粉碎。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痛定思痛之余,国人很快就将国体的贫弱与国人的贫弱联系在一起,一时间,“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的思想盛行于全社会<sup>[2]</sup>,这也使身体改良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各界所关注的要点。谭嗣同<sup>[3]</sup>提出中国人一定要练就“威力、奋迅、勇猛、大无畏、大雄”的躯体;梁启超<sup>[4]</sup>更是高声喊出“中国之武士道”的口号,希望恢复失落了的中华尚武精神,重振蹈扬激励、勇于赴死的古代侠士风。此时,各式兵操、体操等西方身体练习方式随着新式教育、新式军事的兴起而大量涌入国内,一时蔚为风气。以武术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身体练习方法也因势而动,加入到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身体改良运动的大潮中,开始了现代化转型之路。

实际上,受义和团运动负面效果的影响,20世纪初,民间武术一度被视为愚昧落后的行为表现。武术获得新的发展机会,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民族主义与军国民主义的迅速崛起,使国人对于进行具有本民族特征的军事化身体操练产生强烈需求,武术作为旧时代军事训练的遗存,可以填补这一空缺;二是得益于一部分社会精英对“国粹”的提倡。辛亥

革命后,民国有名无实,一时乱象丛生,导致部分人对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大失所望,以至社会上“求欧化而兼重国粹可也,弃国粹而偏重欧化不可也”的呼声不绝于耳。<sup>①</sup>这为武术等传统文化的再生提供了契机。这段时间里,有不少人为构建以武术为中心的中国本土体育体系做了许多探索和试验,虽然出现了很多问题,但也取得一定成就。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马良的中华新武术和精武体育会的“精武武术”;以及张之江的中央国术馆和“国术”体系。

### 1.1 中华新武术

中华新武术(简称“新武术”),是北洋军人马良于1911年前后创立的武术教学体系。新武术的特点,一是遵循删繁就简的原则,将门派众多、套路繁杂的传统武术简约为拳脚术、棍术、剑术等几个科目;二是依据山东、河北等地的武术传统,将摔跤纳入新武术,以弥补传统拳术没有对抗性赛制的缺陷;三是仿照西式体操训练模式,使之摆脱旧式师徒传授方式,转而进入近代教育体系,特别是中学系统中,以求规模化教学效果。新武术自创立起,至1915年前后进入高潮,1917年被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定为学校体育课程的参考教材,<sup>②</sup>1918年初众议院通过了《推广中华新武术建议案》<sup>[6]</sup>。同时,北方各省也先后成立了若干“新武术传习所”。但随着1919年“山东惨案”与1920年“直皖战争”接连爆发,马良本人军政权力尽失,初具规模的新武术顿时人气大丧而走出大众视野。

### 1.2 精武武术

精武体育会初创于1909年,但它真正产生社会影响力,建构起系统化的武术传播与教学体系,是在1916年上海精武总会成立以后。精武会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宗旨,发扬所谓“博爱、自由、平等”的“精武精神”。<sup>③</sup>在传播上,精武会的武术教学一直以北方民间拳种为主,其中又以谭腿、工力拳等基础性拳术套路为主要的教学内容。精武会到1920年前后进入全盛期,曾传及中国南方9省,设有分会37处,会员达到40多万人。2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海外发展,在包括马来亚、新加坡、越南、印尼等国在内的东南亚地区,精武分会也曾达到38处之多,几可与国内局面相媲美。1926年国民政府成立后,精武会曾尝试“国立化”,但未获国民政府接受。抗战爆发后,受政局影响,以及会内结构的变化,海内外发展均遭受重挫。1949年后,国内影响力消弭殆尽,名存实亡;海外精武会呈独立发展状态,形势也不复当年之盛<sup>[7]</sup>。

### 1.3 国术

中央国术馆创立于1928年,由前西北军高级将领

张之江发起并担任馆长。成立之初称“国术研究馆”，后于1928年3月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央国术馆。其宗旨为“发扬武术国粹，增进全民健康，化除派系，整理教材，训练师资，统一教学，研究改进，务求普及，以达明耻教战，强种救国之使命”<sup>[8]</sup>。自创办之日起，张之江借助于国民政府的行政力量，迅速向全国推进，在不到10年时间中，在全国建立起省、市、县，乃至乡、村级别的国术馆网络<sup>[9]</sup>。中央国术馆还于1928年和1933年举办过两次全国性的“国术国考”，推出包括拳械套路、散手、短兵、长兵、摔角等考核内容，开创本土体育多元竞赛化的先河。1933年中央国术馆改制为“中央国术馆国立国术体育传习所”，后易名为“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学制3至5年，成为我国至今为止第一所以本土体育为主导教学内容的体育师范类高等学府。其后，又成立“全国国术统一委员会筹备委员会”，致力于国术统一教材编写。1933年，在中央国术馆的努力下，国术成为民国时期第5届全国运动会的增设项目。1936年，中央国术馆向第11届柏林奥运会派出“国术表演团”，完成了中国本土体育与西方体育在奥林匹克舞台上第一次交流。解放后，国术系统因政治原因被否定，国术体系也因此而告终。

#### 1.4 对3次试验的反思

总结来看，马良的中华新武术产生于晚清，成型于北洋，某种意义上是晚清新军训练“中体西用”的产物，是以德式兵操的为参照，对中国武术进行的一次“兵操化”的改良。其立足点是要通过标准化的教材与教学，对民间武术有所改革，推陈出新，使之成为具有民族特征的体操。同时，由于马良本人对摔角的偏好，促使他将套路演练与摔角技法练习整合为一，将中国武术“练打结合”的传统思维继承下来，为创新发展铺设基础。可惜的是，北洋军阀的派系纷争使新武术自始至终都局限于区域性发展，并带有浓厚的军阀色彩和派系倾向，带有马良本人的特色。因此，新武术被教育部接纳为中学体育教材后，仍遭到改革派的强烈批评和抵制。另一方面，马良曾组织过有一定规模的武术“技术队”，也曾尝试在各地建立“新武术传习所”，举办过“中华全国武术大会”等社会活动。但这些多是凭借马良的军政资源搞起来的，很大程度上是马良个人意愿的拓展，而新武术自身并没有形成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社会团体，更没有扎根社会，形成气候。因此，在北洋时代终结之前，因为马良本人的骤然失势(马良本人后堕落为汉奸)，新武术便随之潮退汐逝，迅速走向消亡。

与中华新武术相比，精武会发展路径明显不同。

从组织性质看，精武会的创立与同盟会等近代爱

国革命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对武术、粤乐等本土文化的提倡，带有浓烈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色彩。但从组织模式来看，精武会则是以近代中国传播西方体育最为成功的基督教青年会(简称“基青会”)为蓝本进行经营。这与精武会创始人陈公哲等人多是成功的商业人士有关系。基青会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为通过商业运作来获得民间社团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范例，精武会对其近于全面效仿<sup>[10]</sup>。而维护民间社团良性发展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就是远离政治，保持社团的政治中立属性。得益于此，精武会在纷乱的民国初期，始终保持相对独立的社会位置，吸引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与资源，特别是获得主张社会革新的工商界、教育界人士的积极支持，保证了自身的稳定发展。作为民间社团，精武会最大的成功，在于验证了西方社团模式在中国本土化发展的可能性。尽管文化背景有很大差异，但武术、民族音乐、舞蹈等本土文化同样可以与西方体育、西洋音乐等和谐共生，并通过社团大面积的传播与普及。同时，精武会通过对外发展，也验证了武术等传统文化形式在海外华人华侨中传播的可能性。这对于20世纪初期，当除旧立新、重西轻中的价值观泛滥全国时，重新在形式上建立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都发挥了一定作用。可惜的是，受自身认识水平的制约，精武会对于武术的认识与整理，一直都缺乏深度思维和理论提升，缺乏学理和技术上的系统性建设。因此，虽然在组织形式上精武会成功地借鉴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模式，但在内容上却缺少创新，没有能形成类似“中华新武术”、“国术”等系统的民族体育概念，很长时间里，它的武术传播维系在以套路演练为主的单一模式上，既没能兼顾套路演练与对抗运动之间的协调发展，也没能开展必要的学术研究活动，理论苍白浅显。虽然，在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在经历了“土洋体育之争”的洗礼之后，精武会提出了“新武化”的概念，并逐步创编有精武特征的“武操”教材，但仍缺乏应有的传统蕴涵和创新意趣，“武操”的提法及其杂乱无序的技术内容，难以获得社会广泛认同，也就是意料中的事了<sup>[11]</sup>。纯社团化发展的松散结构与发展模式，从根本上决定了精武会无法担当威权时代武术转型重任，也就无可避免走上衰落。应该说，它的衰落也有世时移易的原因，而更主要的还是自身原因，是内因。

国术体系产生最晚，我们还不能判定“国术”一词出现的准确时间，但这一概念的明确使用，无疑是在经历了北洋时期的复古风潮和“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的强烈反弹之后，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与“国学”勃然兴起密切相关的。“国术”概念的创立，

初衷是要建立容纳有武术及其他传统身体练习方式的体系,本质上乃是具有现代体育特点的本土体育体系,以便于与“新文化”运动后逐渐趋热的国学建设相呼应,终极目的是要完成中国传统身体文化在身体练习方式上的现代转型。为此,张之江选择以国家权力为依托,与教育、军政紧密相连的发展模式。他通过参与教育部体育委员会,以及建立“中央国术馆”这一具备一定政府职能的机构,求取国术发展的行政优势。在理念上,张之江意识到以现代竞技运动为主体的西方体育,在现代体育教育中已然成型,占据坚不可摧的主体位置。因此,他对杂乱无章的传统武术进行整理、改良和重新建构,最主要的是在保留套路演练作为普及内容的基础上,推出包括散手、短兵、长兵等以西方竞技运动为蓝本的本土竞技项目,最大程度地弱化旧的门派、拳种、师承理念和界限,消减这类旧意识对武术社会化发展的制约和扭曲,并通过“国考”形式进行竞赛试验,努力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运动会模式。在经过两次全运会、两次国考,以及数十次省市级别的“国考”与运动会的试验与历练之后,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术作为参照西方体育但又有别于西方体育的中国民族体育体系已初具规模,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的亮相,更是现代化视野下中西身体文化的一次交流与碰撞,其文化价值之高,不亚于甚至超过中国参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自身。这些都使国术体系顺利地成为中国传统身体文化现代化转型最重要的成果。它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具有现代体育特征民族体育体系。显然,国术的诞生并非凭空而降,它是中华新武术、精武会等诸多武术现代化试验与积淀的结果,它的形成凝结着马良、陈公哲、张之江、王子平、唐豪等许多民族体育家的心血;同样也包含着麦克乐、吴蕴瑞、袁敦礼、程登科等现代体育家与教育家的智慧。可叹的是,这样容纳有多元因素并富有试验精神的成果,1949年后竟被彻底放弃。随之而来的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对武术“整顿”与改造,本质上是改弦更张,其后走了一条以“批判”、“斗争”为理论主导的“创编”之路,“竞技武术”便应运而生。

与新武术、精武会相比,具有“官办”身份的国术馆和国术,在成就上明显更为突出,更有价值。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新武术、精武会都有其先期价值,马良的思路对张之江是有影响的,张之江也曾经有过“新武术研究会”的创建和尝试。精武会的社团化模式对基层国术馆的社团化趋向也有参照性影响,尽管精武会一直都对国术馆和国术不表认同,甚至有对着干的意味,但仍然不妨碍彼此间的交流和参照。

## 2 “竞技武术”的得与失

解放后,武术的发展之路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体操为设计蓝本,融合武术套路、技巧、舞蹈、戏曲等众多形体类运动形式,以所谓“长拳”的名义创编出的“竞技武术”,成为武术的核心,在中国武坛独领风骚达60年之久。一段时间里“竞技武术”被冠以“国家规定”的桂冠,高踞于民间武术之上,其情形类同于“革命样板戏”,故民间有“样板拳”之谓。作为新中国武术运动的主导模式,竞技武术有其不可忽视的成绩,这是应当指出的。

首先,它打破了传统武术以经验为主导的训练与传播模式,将竞技体育专业化训练方式带入武术,建立专业运动队,在短时期内明显提升了武术技巧的表演难度和整体水平,提高了技术和术语的规范化水平。其次,武术运动作为体育竞赛项目被纳入国家体育管理体制,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在武术运动的开展、武术传统的挖掘均得到国家的政策支持和资助。特别如简化太极拳、初级拳、初级刀剑、青年拳等套路的诞生,结构清楚、简便易学,有益于武术的社会化发展。再次,竞技武术先后培养出许多优秀运动员与教练员,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成为我国对外文宣的重要手段,频繁出访,在许多国家进行表演,对促进我国的国际关系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最后,为演艺界输送了大量演员,提升了武打片的打斗表演水平。当武打演员一度成为专业武术运动员最体面也最让人艳羡的出路,风气之下,产生了诸如李连杰、于海、赵文卓、吴京等优秀专业武打演员。

然而,纵观解放后以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体育发展的大格局,人们不难发现,当日本武道,韩国跆拳道,甚至泰拳,在国内外都已取得显著发展的时候,中国武术却一直停留在“博大精深”的虚荣之中,并没有突破性发展。相反练者日见减少,市场不断萎缩,甚至一些曾经十分畅销的武术杂志也难以维持。竞技武术的国际化发展严重受挫,在北京举办奥运的大好时机之下,并没有能成为奥运项目,迄今入奥前景渺茫,主管部门不再谈论这个话题。民间武术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除了太极拳情况较好外,练其他武术的人越来越少,青少年练习者尤其少了。普遍反映练武术既不传统,也不时尚,练不如看,看不如听。看功夫片,看武侠小说,听评书,都比现实的武术精彩得多。就算是国家级乃至国际级的武术竞赛,也往往观众寥落,传媒和社会关注度更是每况愈下。武术大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武术自身而言,显然与长时间以“竞技武术”为发展主导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武术官员们一力扶持的“竞技武术”引领着中国武术走向一步一步衰落之路。面对

现实,“竞技武术”的利弊得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到了应该深刻反思和改弦更张的时候了。

## 2.1 否定国术导致武术文化的断裂

经历了将近30年的磨炼,作为中国民族体育第一个相对成熟的现代体系的国术,曾获得体育界、教育界的普遍认同,同时也有不足之处,存在不少问题,这也是许多人曾经坦诚指出过的。毕竟,将原本杂乱无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整合成一个有机的竞技体系,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需要理论探索,需要借鉴现代教育学、体育学的理论以完善自己的学理。总之,它既需要保持民族体育的原生性与本土特色,又需要学习西方体育的优点,推动它的继续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张之江曾不断强调国术的“科学化”,强调国术既是本土的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和世界的。现在看,这些理念无疑是正确的,是有道理的。

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时间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及其思潮,严重影响到所有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作为传统体育形式的武术,同样不能幸免。

“武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方针<sup>[12]</sup>,导致对解放前所有武术转型实验,特别是有国民政府背景的国术的否定、批判与歧视。1955年开始,对民间武术实行“全面整顿”,武术社团被取缔,一切活动统归武协管辖。后来长时间主持武术工作的毛伯浩先生曾直言“国术”是“继承了封建的组织形式和封建的思想道德观念的衣钵。”<sup>[13]</sup>参与创建“竞技武术”的蔡龙云先生说,旧社会“武术运动……在“全盘西化”和“复古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被搞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sup>[14]</sup>对此类观点,有武术界人士提出过不同意见,但均遭受到政治上的压制,有的甚至被打成“右派”。经过一段时间的筹措,至1957年,以套路表演为比赛模式的“竞技武术”正式出台。不久被列为国家竞赛项目,自此归入计划经济下“举国体制”之内,堂而皇之的吃起大锅饭。1959年是竞技武术大发展的年份,年初有全国青少年武术运动会,年末又有第一届全运会,与等级运动员制度相配套甲、乙、丙3套“规定套路”已经齐备,以此为教材,北京举办了全国教练员培训班。同时,各省纷纷成立武术专业队,一批优秀的武术运动员崭露头角,他们跳得远,翻得高,扮相靓丽,神彩飞扬,充分展现新式套路的花巧风采,一时引人注目,风光无限。借用“长拳”名义所建构的“竞技武术”成了“国家规定”的套路与风格,成为高踞天下武林的一统之尊。作为点缀,其他武术流派、拳种也偶有露面,有的点缀效果不错,格外受到青睐,但时间久了,大都在“长拳”风格的引领下变得不伦不类、花枝招展起来。舞蹈化、技巧化是大势所趋,对民间

武术的压制和引领非常强势,造成的后果也非常严重。

国术的最后一次集体亮相,是1953年天津民族形式体育表演与比赛大会,此后,摔跤、射箭成为单列项目而存在了一段时间,最终也走向衰落,至于散手、短兵、长兵、弹丸、踢毽、测力等,1953年以后便告别了国家赛场,或悄然回归民间,或就此慢慢人间蒸发。张之江们辛勤经营起来的国术,最终分崩离析,全局皆溃,真正被打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了。

“文革”结束后,摔跤、短兵、散手都曾有所恢复,但摔跤始终进不了全运会,只能在少数民族运动会上占一席之地;短兵寿命最短,只露了个头,便重归沉寂;散手被逐步改名为“散打”,虽然同属于“竞技武术”,实际上与套路比赛分道扬镳,发展成一个“特立独行”的项目。其它项目只能在民间自生自灭。

否定国术,另起炉灶,推出所谓“竞技武术”,本质上就是否定了武术文化的传统性和发展规律,是极左思潮支配下的政治对文化的强力干预,它的后果是导致武术文化的断裂,导致武术发生结构性变异,走向一条越来越虚花而浅薄的非武术化之路。对国术的否定,最重要的是抽掉国术所继承的“练打结合”的武术传统,要害是排斥武术所固有的对抗性运动特征。20世纪50年代,张非垢、毛伯浩等人对张轸、吴高明等提出重视国术试验成果,保存武术“练打结合”特征的观点,扣上“唯技击论”的帽子。<sup>④</sup>为了响应毛伯浩对于武术运动的基本观点,蔡龙云先生于1957年在《新体育》上发表了《我对武术的看法》一文,明确提出武术“可以看做为一种古典艺术体操”,而武术的实用性“仅保留它的运动特点”就行了。<sup>⑤</sup>值得玩味的是,这与他之前的观点发生了微妙变化。1956年,蔡龙云曾就武术的基本结构有所论述,指出武术技击是“体育竞技运动”,而套路演练是“古典艺术体操”的基本认识<sup>[14]</sup>。这实际是相对准确的诠释,说明作者对于武术运动的本质其实是有所了解的。而在1958年的《武术运动基本训练》里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武术运动发展到今天,已是技击、舞蹈、体操三者结合为一的体育运动了。而技击、舞蹈又都是为体操(身体操练)服务的。所以说,武术运动在今天或者说在近代已不是单纯的技击、舞蹈或体操,而是技击动作、舞蹈动作和体操动作的综合,锻炼身体、培养品质、发展艺术兴趣的一项既是操练身体又是表演艺术的独特的体育运动。”<sup>[15]</sup>从而彻底将“技击”的实际价值从武术中剔除,它的存在只能以“技击动作”表演化和艺术化为依托。请注意,这就是“竞技武术”的核心价值观,是“竞技武术”的立足点。

今天看来,新中国武术的设计初衷,是要将其改

造为一种在形式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普及型体操运动，其目的更多在于体质、参与、观赏、审美，而非竞技。同时，反传统的设计定位，使竞技武术自一开始就站在了“传统”的对立面，因此抛弃了传统武术几乎所有的文化特质。而当“举国体制”崛起以后，对“金牌效应”的随众心理又驱使“竞技武术”陷入对高水平竞技体育的体制性迷恋之中。作为全运会中唯一的非奥中国项目，竞技武术一直遵循“高、难、新、美”的发展追求，而技术水平却不是越来越高，而是越来越低，毕竟挟“左潮”以自壮声色的时代过去了，教练员、运动员有了较多的自主权。“竞技武术”的这一充斥着主观判断与感性考量的项目发展标准，与现代竞技体育追求衡量标准客观化、绝对化的发展大势之间，无疑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本质矛盾，而竞技武术只能够通过进一步的体操化与舞蹈化，追赶着“竞技”，一追就是几十年。时至今日，竞技武术不但在形式上与武术渐行渐远，在本质上则早已异变，它既非武术，也非体操，真不知道应该叫做什么。

## 2.2 传统武术的价值体系丢失

从中华新武术始，至张之江的国术体系，都将消除民间武术“门派丛生、套路繁杂”的状态视为主要目标之一。诚然，作为主要产生在封建时代的传统文化形式，武术带有很强的民间性，沾染了不少陈旧的东西。但普遍存在的门户意识、师徒观念，乃至神秘主义色彩等，某种意义上也是武术的文化特征，是支撑武术作为完整文化整体的重要意识形态。因此，对于许多民间拳师或者拳种而言，削弱了这些内容，往往就是削弱了个体文化的个性与特质，是关系兴衰起落的大事，所以应该慎言批判，所谓糟粕与精华的分辨更是要慎之又慎。然而，得益于现代意识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科学观念的不断引入，民间武术从清末就开始发生某些内在变化。一方面，庚子事变引发人们对民间武术的重新认识和评估，许多文化定位低下、封建意识浓厚的拳种拳师在社会变革中被淘汰；另一方面，一些识见较高的武术家在维新思潮影响下开始尝试不同拳种的整理与整合，追求武术文化的新旧蜕变，这从马良的一个“新”字上就看得分明。孙禄堂对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的兼容并练；马凤图对劈挂、八极、翻子等拳种的融通整合等，王芗斋推出的“意拳”系统，也都是试图走“各家拳法兼而习之”的因流分类的融通兼备之路，是对狭隘的门派界限的冲击。而精武会、国术馆等各式武术社会化，教育化的试验则促使民国武术的这一趋势获得进一步的深入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尽管旧式的师徒、门派关系仍广泛存在于民间，但武术运动的教育化与社

团化已经使师徒关系逐步转化为老师与学生、教员与学员的现代教学关系，并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

20世纪50年代以来，武术发展主要围绕竞技武术转，这保障了官办武术系统始终建立在教练员与运动员，老师和学生的现代关系之上，应该说这是好的一面，不过这个“面”很小，影响有限。而对民间武术的漠视和边缘化，使一些陈旧的东西仍能以暗流存在，有它的生存空间。改革开放后，这些东西喷涌而出，不但陈旧如故，而且花样翻新。20世纪80年代初，以武侠小说和电影为主体的港台武侠文化大规模传入内地，一度成为中国市民文艺生活的重要内容，武术管理部门也积极介入各种武术文艺活动，从而掀起全社会的武术热。禁锢已久的武术政策也有所调整，学术气氛有所抬头，国家甚至拨款进行了大规模的武术古籍、文物和拳谱、秘笈的挖整工作。然而，以竞技武术为核心的武术发展道路却并没有所修正，作为全运会项目，“金牌效应”使武术工作根本无法摆脱旧框框，社会武术工作始终流于表面，难以深化。最严重的是对民间武术错误导向，致使许多早被淘汰东西死灰复燃，民间武术成了伪科学、假气功的温床。民国时期已经出现的门派、拳种分流归类的趋势又逆向发展，不断有新的门派拳种被“发现”，管理部门坚持以多为盛，以多为荣，无形中助长了胡编滥造之风，仅太极拳就至少衍生出了上百余个新流派。“九天玄女传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尼姑”的现象再度随处可见。至80年代后期，神秘主义膨胀最终在气功热潮中引发井喷，其中一部分孳生成为危害社会的邪教。社会民众对于中国武术的认识除了“博大精深”这类空洞描述外，大都视套路演练为花拳绣腿，视散打比赛为逞勇斗狠，与民众对于来自邻邦的空手道、跆拳道认识相比较，文化含量上不可以同日语。

## 2.3 民族体育人才链断裂，学科水平下滑

国术的成功点之一，是它不但初步建立起技术、训练、竞赛体制，更为重要的是建成了相对稳定的人才梯队，首先是网罗和造就一大批一专多能或多专多能的民族体育家。其中如王子平、佟忠义、马英图、唐豪、吴志青、李元智等，对中国民族体育的现代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其次，中央国术体育专科学校成立后，尽管办学条件、师资、经费都很有限，但作为我国第一所国术与体育综合专业学校，却有很高的成材率，培养出一批新兴的学术兼优的民族体育家。直到解放后，他们仍然是新中国武术界最重要的群体，如王子平、佟忠义、唐豪、郑怀贤、张登魁、张文广、刘玉华、温敬铭、康绍远、蒋浩泉等等，为新中国的武术事业做出了贡献。令人叹惜的是，国术体系遭遇

否定,套路演练成为武术的唯一形式,这些民族体育家们便失去了用武之地,他们的民族体育技术和理论都无从发挥作用,加上经历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使这些“国术遗民”大都战战兢兢,谨言慎行,除了勤恳工作,不敢对“竞技武术”有丝毫批评。时光如梭,以国术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民族体育体系,无论在技术上和理论上,都发生了无可挽回的人才断层,在新一代的民族体育人才群体中,已很难再见到郑怀贤、张登魁、张文广、刘玉华、温敬铭、康绍远、蒋浩泉这样的老师了。不要说多能,就是真正的一专之才也为数有限,这就是专才教育的结果,是专才教育和竞技武术互为因果而恶性循环的结果。

以竞技武术为主导建立起来的武术理论体系,缺乏应有的学术传承与完善的学科体系,总体上显得浮浅且误谬多多。即使是被指出问题后,也无法进行自我调整,以至陷入“将错就错,死不认错”的怪圈。随着中国体育学科的整体发展,特别是1997年体育学科调整之后,以武术为主体的民族传统体育学应运而生,但武术界长时间“重术轻学”,学术建设严重滞后,使竞技武术无力支撑民传学科的良好发展。这不但使民族传统体育成为体育学4个2级学科中明显弱势的学科,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学科人才匮乏与发展畸形,使武术研究群体陷入术而不学、学而不术的尴尬境地。当今的武术科研成果,主要由数量庞大的“看图识拳”型武术书籍构成主体,大量关于武术的历史与现实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却被束之高阁,少人问津。实际上,武术科研的滞后,从大量再版的民国武术书籍成为当今武术畅销书的现象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眼见民族传统学科在竞技武术引领下步入“太虚幻境”,散手逐渐沦为不伦不类的打斗之术时,竞技武术学界却只见千士之诺诺,不见一士之谔谔。畅言武术思想、哲学、秘术者多,而审视当代武术困境与危机者少之又少,面对中国民族体育的巨大困窘,陷入集体性失语。

重新反思近百年中国武术转型的历程,对武术发展重新定位是非常必要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武术是中国传统身体文化的代表性内容。在当今倡导文化复兴的大前提下,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身体文化同样是民族国家重要的文化实力。谁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竞争中获得主动。这一来之不易的认识,已经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也正在以文化回归、国学勃兴、道德重建等多种形式汇为潮流,推动着伟大祖国现代化进程的顺利完成,推动着民族复兴大业的早日实现。因此,武术发展在突破竞技体育的束缚后,应更为广泛地与教育、

文化行业相并联,成为新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全民健身运动的重要内容。只有如此,中国民族体育系统才会有重生的机会。

### 注释:

- ① 慕韩. 文学与国家关系, 学艺杂志, 第一期, 1912(11)。
- ② 马良. 中华新武术发起总说: 棍术科, 1918: 1-3。
- ③ 精武体育会. 补篇. 精武本纪, 1919: 16-18。
- ④ 吴高明. 武术是锻炼身体的方法——关于武术的几个问题和蔡龙云同志商榷. 新体育, 1957(98)。
- ⑤ 蔡龙云. 我对武术的看法. 新体育, 1957(2)。

### 参考文献:

- [1] 安东尼·吉登斯[英]. 生活在反传统社会中[M]. 上海: 商务艺术馆, 2001: 56-57.
- [2] 辜鸿铭. 张文襄幕府记闻(九): 清流党[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5: 18.
- [3] 严复, 胡伟希. 严复集[M].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7.
- [4] 谭嗣同. 仁学[M]. 台北: 台北大中书局, 1958: 35-36.
- [5] 梁启超. 中国之武士道[M]. 上海: 上海广智书局, 1904.
- [6] 特别记事[J]. 教育杂志, 1918, 10(11): 23-26.
- [7] 马廉祯. 民国时期东南亚精武会的盛与衰[J]. 安阳师院学报, 2011(3): 25-30.
- [8] 张润芬. 张之江传略[M]. 上海: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4: 56.
- [9] 中央国术馆. 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G]//徐百齐. 中华民国现行法规大全.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 4240-4241.
- [10] 马廉祯. 略论中国近代本土体育社团对外来社团在华发展的借鉴——以精武体育会对基督教青年会的模仿为例[J]. 武术科学, 2010(3): 68-70.
- [11] 马廉祯. 论现实视角下的近代“土洋体育之争”[J]. 体育科学, 2011, 31(2): 76-84.
- [12] 武术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N]. 体育报, 1965-03-29(8).
- [13] 陈捷. 驳王新午的谬论[C]//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运动司武术科编. 武术教材参考资料之一——武术运动论文集.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58: 19.
- [14] 蔡龙云. 丰富多彩的祖国武技艺术[N]. 人民日报, 1956-11-29(7).
- [15] 蔡龙云. 琴剑楼武术文集[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7: 72.